

张蓉镜抄本《元朝秘史》考述

罗 恰

《元朝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现存文本为明初四夷馆汉文本，明洪武年间成书以来，传世各版本可分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两个版本系统。自清代以来，十五卷本流传最为广泛，有十数种之多。其中张蓉镜抄本虽见于清人著录，然一百余年来未见其踪，更未有专文论及。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此张蓉镜抄本，与其他各本相较，显出其独特之文献版本价值，可作为校勘《元朝秘史》的主要参校本之一，其相关研究尚待深入。

关键词：元朝秘史 十五卷本 张蓉镜 蒙古文献 元朝

作者罗恰，湖北省博物馆馆员。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路 160 号，邮编 430077。

《元朝秘史》又名《元秘史》、《蒙古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学文献，记载了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其先世的谱系与业绩，及元太宗窝阔台统治时期的历史，生动地描绘了十二至十三世纪蒙古社会的人文风貌，是研究古代蒙古史最为基本的史料之一。《元朝秘史》原文为畏兀体蒙古文，早已散佚不存；现存文本为明初四夷馆的汉文本，其正文是以汉字读音标写蒙古语，正文右侧逐词标注汉译，即旁译，每隔一段内容后有汉文总译，全文共分为 282 节。其形式之所以如此特殊，一般认为是明初统治者出于培养蒙汉翻译人员的需要。《明太祖实录》记载当时翰林院曾编写《华夷译语》，编写方式是“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饰、器用，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①《元朝秘史》成书之背景应与之类似。

一、《元朝秘史》版本简述

《元朝秘史》一书流传至今之诸多版本，可分为十二卷本及十五卷本两个系统。两种版本内容相同，所不同者惟分卷有别。十二卷为最初之划分，由正文十卷与续集二卷构成，十五卷乃后出。《元朝秘史》成书后，洪武年间已有刻本，即十二卷本；后为《永乐大典》抄入，并由十二卷改为十五卷。洪武刻本全秩今已佚，仅在 1933 年于故宫发现残页四十一张。^②

清嘉庆十年（1805）顾广圻“忿惠”藏书家张敦仁（字古馀）从张祥云处“覆景”一部“通体完善”的“景元椠旧钞本”，并进行校勘，^③后成之本一般称为“顾校本”或“顾氏监抄本”。此本为

① 《明太祖实录》卷 141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丙戌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年校印本，第 2223—2224 页。

② 参见张元济《四部丛刊三编》史部《元朝秘史》影印本跋。

③ 参见顾广圻著、王欣夫编：《顾千里集》，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283 页。

十二卷本，其底本即洪武刻本。今洪武刻本、张祥云藏本俱已失传，而十五卷本均出自《永乐大典》，故顾校本便成为现存最佳之抄本。顾校本后为清宗室盛昱所得，文廷式、李文田曾据盛昱藏本各抄录一部。清光绪戊申（1908），叶德辉据文廷式抄本校刻出版，即“观古堂本”或称“叶德辉本”。盛昱身后，藏书四散，顾校本转为涵芬楼所有。傅增湘《钞本〈元朝秘史〉跋》详记此事云：“此书旧藏盛伯羲祭酒家，癸丑岁，意园藏籍星散，余偶见之正文斋谭笃生许，因告菊生前輩，為涵芬樓收之，而余为之諧价焉。”^①1936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樓影印顾校本，并以发现于故宫的明刻残叶41张替换了顾校本中相应的部分，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中。因此，《四部丛刊》三编本成为学界普遍使用的本子。十二卷本《元朝秘史》自清代以来一直是研究者的主要文本依据，其影响虽甚大，流传却不及十五卷本广泛。

钱大昕曾有一部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顾广圻云：“《元朝秘史》，载《永乐大典》中，钱竹汀少詹家所有，即从之出，凡首尾十五卷。”^②学界普遍认为此后世传十五卷本均自钱本录出，但钱氏《补元史艺文志》著录的却并非此本，原因尚不明。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穆曾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十五卷，^③后刊印收入《连筠簃丛书》，此本只有总译部分，非《元朝秘史》一书之全貌。钱大昕所藏十五卷本后被鲍廷博抄录一部，辗转为韩泰华所有，同治十一年（1872）为俄国主教帕拉基购得。伯希和旅苏时曾将此本摄影，并于1933年赠予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此即为学界普遍使用之鲍廷博抄本（即“俄本”）。

除此本之外，十五卷本尚有陆心源旧藏本、孙星衍旧藏本、瞿镛旧藏本、翁同书旧藏本、马玉堂旧藏本、王宗炎旧藏本等十数种，其中有一些见于著录而久不知所踪。^④截至目前，学术界使用的《元朝秘史》版本主要有三种，即顾广圻校本、鲍廷博抄本及叶德辉刻本。

二、张蓉镜抄本《元朝秘史》概况

清人张蓉镜曾抄有一部十五卷本《元朝秘史》，见于清人书目记载。陈树杓《带经堂书目》著录云：“《元秘史》，十五卷，张蓉镜钞本。”^⑤周星诒《传忠堂书目》著录为：“《元秘史》，十五卷，四册，不著撰人，张蓉镜钞本，蒙古语未删。”^⑥带经堂为陈树杓之祖陈征芝[嘉庆七年（1802）进士，清代著名藏书家]藏书楼，所藏至八万卷，明抄本甚多，且皆为明以后久佚或世所罕见者。^⑦

① 傅增湘撰：《藏园群书题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② 顾广圻著、王欣夫编：《顾千里集》，第283页。

③ 参见王俭：《张穆年谱》，三晋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

④ 关于《元朝秘史》一书的版本源流情况，参见白·特木尔巴根著：《〈蒙古秘史〉文献版本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161页；洪煨莲著、张乃骏译：《〈蒙古秘史〉的版本流传》，《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1期；[日]原山煌著、乌力吉图译：《论〈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对陆心源旧藏本的研讨》，《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3期；甄金：《〈蒙古秘史〉源流研究概述》，《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白·特木尔巴根：《〈元朝秘史〉（十五卷本）第一卷校异》，《内蒙古师大学报》1987年第3、4期；白·特木尔巴根：《明代史乘著录〈元朝秘史〉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白·特木尔巴根：《清代藏书家著录〈元朝秘史〉考略》，《内蒙古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白·特木尔巴根：《喀喇沁亲王府所藏〈元朝秘史〉抄本及其学术价值》，《内蒙古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乌兰：《〈元朝秘史〉版本流传考》，《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等。

⑤ 陈征芝藏、陈树杓撰：《带经堂书目》卷2，林夕主编：《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第28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13页。

⑥ 周星诒辑：《传忠堂书目》卷2，《丛书集成续编》第71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04页。

⑦ 参见刘大治：《清代福州藏书家》，《闽都文化研究》2006年第1期。

陈树杓亦嗜藏书，且精于鉴别版本，周星诒之书大半得自其家。^① 陈、周二人所藏应为一个本子，具有递藏关系。从陈征芝的生平来看，此抄本之时间应不晚于道光年间。近来笔者于湖北省博物馆旧藏古籍中获见一部《元朝秘史》十五卷抄本，仔细目验此本，为陈树杓与周星诒曾著录之张蓉镜抄本（以下简称张本）无疑。

张蓉镜（1803—？），清藏书家，字伯元，号芙川，小名长恩，江苏常熟人。张蓉镜与其祖张燮、父张定球一家三代皆嗜书，建有小琅嬛福地、味经书屋、双芙阁藏书，为常熟书香世家。张蓉镜妻姚畹真，亦嗜书，二人鉴别精审，校书不倦，一如赵明诚、李清照夫妇，^② 堪称藏书史上的一段佳话。

湖北省博物馆藏张本全四册，书衣有柯逢时手书题签“元朝秘史十五卷 四册”，通高 28.6 厘米，广 21.7 厘米，半页十行，行三十字，无格，白口，版心题有卷数，一页两面，页码标于版心下端，卷自为页。惟装订时，误将卷二第二页订入卷一第二十至二十一页之间。卷前有钱大昕《跋元秘史》，跋首页钤有“虞山张蓉镜芙川信印”、“琴川张氏小琅嬛清閟精钞秘帙”、“柯逢时印”三印，每卷卷端均钤有张蓉镜藏书印一至四枚不等，有“成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诸”、“小琅嬛福地缮钞珍藏”、“琴川张氏小琅嬛福地缮钞秘册记”、“蓉镜私印”、“琴川张氏小琅嬛福地藏书”、“张伯元别字芙川”、“并蒂芙蓉小榭”、“蓉镜收藏”、“小琅嬛清閟张氏收藏”、“小琅嬛福地”、“小琅嬛阁缮钞”、“芙川”、“蓉镜”等。各册卷次分别为：

第一册：钱大昕跋文，第一、二、三卷；

第二册：第四、五、六、七卷；

第三册：第八、九、十卷；

第四册：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卷。

各卷页数如次：

卷次	页数	卷次	页数	卷次	页数
第一卷	27	第六卷	16	第十一卷	13
第二卷	21	第七卷	26	第十二卷	15
第三卷	21	第八卷	24	第十三卷	24
第四卷	22	第九卷	19	第十四卷	15
第五卷	19	第十卷	18	第十五卷	12

张本每卷之页数全同于孙星衍藏本与瞿镛藏本，而与王宗炎藏本小异。

张本首卷标题下无“忙中豁仓钮察 脱察安”两行字，与顾广圻跋中所言钱大昕藏十五卷本合。鲍廷博抄本与陆心源抄本所有之各种题记、附文及黄丕烈致鲍廷博短简在此抄本中俱无。另人名、氏族部落名、地名亦无短线标明。行段亦间有小异。

鲍廷博抄本有三大舛误，为多数十五卷本所共有，即第 194 节的错简（自第 194 节正文第三行即 8—12b 之最后一行开始错简，将见于二十二行塔阳中罕说的话移至古出鲁克中罕名下），第 237 节的脱简（第 236 节后脱漏了第 237 节，紧接着就是第 238 节），第 272、273 两节的错简（将巫师施法术并与窝阔台对话之事割而为二，移至 14—11a 的最后一行，在第 272、273 两节之中出现错简）。张本在第 194 节未出现错简，与顾校本一致，而后两处舛误则与鲍廷博

^① 参见梁战、郭群一编著：《历代藏书家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0 页。

^② 参见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4 页。

抄本一致。此种情况与孙星衍藏本、瞿镛藏本、王宗炎藏本相同,表明这四种本子极有可能源自同一个祖本,即第194节没有错简的一个本子,抑或互相存在过录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

孙星衍藏本卷四末有题记云:“嘉庆甲子十一月二十四日从刻本补写讫。”鲍廷博藏本卷七末亦有题记云:“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通介叟记。”卷九末的题记为:“嘉庆乙丑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七十八叟识。”陆心源藏本卷五末有题记云:“嘉庆甲子十二月十一日从刻本补写。”卷六末有题记云:“嘉庆乙丑正月初三日从刻本补写讫,七十八叟记。”卷七末有题记云:“嘉庆乙丑元宵从刻本补写讫,通介叟记。”题记应均出自鲍廷博,但笔迹不同,其所谓“刻本”即其所藏十二卷残刻本,后为黄丕烈购得。据此数条类似题记,此三本应存在密切联系,而孙星衍藏本不仅第194节未出现错简,且其题记时间早于陆心源藏本与鲍廷博藏本,版本价值应当更大。张本与孙星衍藏本版本特征更近,其版本价值较之陆心源藏本与鲍廷博藏本也应该更佳。

三、张蓉镜抄本《元朝秘史》校勘特点

以乌兰校勘四部丛刊三编本与张本比勘,^①仅就第一卷言(张本第一卷全卷及第二卷部分内容有朱笔点校),亦颇能见其异同。

第一,张本多用俗字,或用异写,有与四部丛刊三编本不同者,如第一节卷一页一上第五行(卷、页、行悉遵四部丛刊三编本)“沐^舌涟讷”,张本作“沐^舌连讷”;第五十三节卷一页三十三下第三行“哈赤(雠)”,张本作“哈赤(仇)”;第六十四节卷一页四十四下第四行“中合塔^舌刺温^勒周(點着)”,张本作“中合塔^舌刺温^勒周(点着)”等。

第二,张本存在明显笔误之处,如第六节卷一页四上第三行“阿亦速^中浑”,讹作“阿亦远^中浑”;第六节卷一页四下第一行“兀者^舌列(看)”,讹作“兀者^舌列(着)”;第九节卷一页六上第二行“卯兀刺^勒都周(烦恼着)”,讹作“卯兀刺^勒都周(头恼着)”;第十七节卷一页十上第五行“额^舌列(丈夫)”,讹作“额^舌列(大夫)”;第二十六节卷一页十六下第三行“赤那因(狼的)”,讹作“赤那因(狠的)”;第三十七节卷一页二十二下第一行“阿^勒斤赤(头哨)”,讹作“阿^勒斤赤(积哨)”;第四十四节卷一页二十六上第四行“阿鲁阿(住来)”,讹作“阿鲁阿(往来)”;第五十节卷一页三十一上第五行“恢突儿(时)”,讹作“恢突儿(晓)”;第五十六节卷一页三十六下第四行“捏客周(追赶着)”,讹作“捏客周(这捍着)”;第六十一节卷一页四十二上第四行“扯克^勒彻儿”,讹作“扯克^勒撒儿”;第六十六节卷一页四十六上第五行“雪你(夜)”,讹作“雪你(花)”等,粗略统计达一百二十五处之多,而多为本校即能发现之误,然朱笔点校者却几乎未予是正,良可怪哉。

第三,张本有脱简,如第二节卷一页二上第一行“撒里^中合察兀(名)”,脱旁译“名”;第七节卷一页四下第五行“斡^克帖埃(与)”,脱旁译“与”;第八节卷一页五上第五行“阿主兀(有来)”,脱旁译“有来”;第九节卷一页六上第三行“孛^勒周”,脱“勒”;第十三节卷一页八下第二行“客^額主兀”,脱“额”;第十七节卷一页十上第五行“阿阑^中豁阿(妇人名)”,脱旁译“妇人名”;第二十三节卷一页十四下第五行“阿都兀孙”,脱“兀”;第三十二节卷一页二十上第三行“斡额迭(逆水)”,脱旁译“逆水”;第四十节卷一页二十三下第一行“途儿(行)”,脱旁译“行”;第四十六节卷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著《元朝秘史(校勘本)》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同时参校以其他十二种能见之本子,堪称目前所见最善之精校本,甚便利用。

一页二十八下第五行总译“名阿答儿乞歹”，脱“乞”；第五十三节卷一页三十四上第二、三行总译“我的十个儿子”，脱“儿子”；第五十八节卷一页四十第二行“乞散(报)”，脱旁译“报”；第六十二节卷一四十二下第四行“客额主兀(就有来)”，脱旁译“来”；第六十六节卷一页四十六下第三行“脱舌列克先(生了的)”，脱旁译“的”；六十八节卷一页四十八下第四行“^{中晃中豁}塔歹”，脱“^{中晃中豁}”等，所脱内容大抵属旁译部分。

第四，除上述差异之外，尚有许多根本性的异文(乌兰校勘本已出校之处不复列出)，如第二节卷一页二上第二行“^{中合}儿出”，张本作“合儿出”；第三节卷一页二下第四行“^{脱舌}罗^{中豁}勒”，张本作“脱罗豁”；第三节卷一页二下第五行“^{中豁}牙儿”，张本作“豁牙儿”；第六节卷一页四下第一行“兀者^舌列”，张本作“兀者列”；第九节卷一页六上第二行“^{中合}札^舌里颜”，张本作“合札^舌里颜”；第十一节卷一页七下第二行“^{中豁}亦纳”，张本作“豁亦纳”；第十四节卷一页九上“帖^舌列”，张本作“帖列”；第十八节卷一页十一上第二行“^{中忽}儿班”，张本作“忽儿班”；第十九节卷一页十一下第三行“不^{中合}秃撒^勒只”，张本作“不^{中合}秃撒^勒吉”；第二十节卷一页十二下第二行“^{中豁}牙儿可兀^惕”，张本作“豁牙儿可兀勒”；第二十六节卷一页十六下第五行“帖^舌列桓”，张本作“帖列桓”；第三十一节卷一页十九第三行“斡亦^舌刺”，张本作“斡亦^舌列”；第四十八节卷一页三十上第三行“持薛出列”，张本作“持薛赤列”；第五十四节卷一页三十四上第四行“释鵠兀阑”、“逐步恢突儿”，张本作“释鵠兀^舌阑”、“逐步恢突^舌儿”；第五十四节卷一页三十四下第一行“阿亦速^中忽宜”，张本作“阿亦速^中忽泥”；第五十五节卷一页三十五下第一行“古儿恢”，张本作“古^舌儿^中灰”；第五十六节卷一页三十八上第四行“诃额仑(名)”，张本作“诃额仑(妇人名)”；第六十节卷一四十一下第二行“朵罗安”，张本作“朵^舌罗安”；第六十三节卷一页四十三下第二行“古兀捏”，张本作“古温捏”等。

相较而言，张本与孙星衍藏本、瞿镛藏本、王宗炎藏本、翁同书藏本在文字上契合度更高，而尤与瞿镛藏本契合度最高。瞿镛(1794—1846)，字子雍，为有清一代著名藏书家，其父瞿绍基喜购书藏书，“镛承先志，搜罗不懈，积十余万卷”。^①其所筑铁琴铜剑楼，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瞿氏藏书多精抄本，是为其一大特色。《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九记载有《元秘史》十五卷抄本，^②但未交待此本何时从何处得来，从著录时间看，应不晚于道光年间，这个时间与张本的时间大致相同。虞山派藏书家藏书多秉持流通致用的原则，瞿氏作为其中的代表，其藏书不自珍秘，常年对外开放，如有所需，甚至代抄代校，使书籍得其所用。瞿镛与张蓉镜同为常熟人，且生活年代相近，二者书籍是否曾经互通有无，囿于所见，尚难论断，但张本与瞿镛藏本之关系甚为密切，当可作定论。

张本字迹端整，字距匀称，保存完好，品相甚佳。因有柯逢时题签及钤印，知曾为柯逢时旧藏。柯逢时之藏书部分来自蒋凤藻和周星诒，^③而周星诒藏书之精者尽归蒋凤藻。^④据此推断，是抄本应该曾经张蓉镜、陈征芝、陈树杓、周星诒、蒋凤藻、柯逢时诸名家收藏，可谓递藏有序。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郑钟祥、张瀛修，庞鸿文等纂：《光绪常昭合志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② 参见瞿镛编纂、瞿果行标点、瞿凤起覆校：《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41页。

^③ 参见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编：《武汉市志·人物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页。

^④ 参见叶昌炽著，王锷、伏亚鹏点校：《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532页。